鄉邦文獻與民族革命——
李根源輯刻滇籍明臣著作的現實關懷

解揚*

本文以雲南騰越人李根源在清末留學日本期間編輯，回國後刊刻的兩部滇籍明臣著作集《滇南五名臣遺集》和《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為切入點，結合他在日本加入興中會後為革命刊物《雲南雜誌》編輯的特刊《滇粹》，討論他在投身革命反滿和抵禦外侮的民族革命過程中，對明代歷史的藉助和帶有的地域性色彩。在晚清，闡揚明史以鼓吹革命是革命黨人和有革命思想的讀書人的普遍共識，李根源選編的滇籍明臣著作令他走在了這一時代風潮的前列。究其原因，有他明遺民家族史的影響，也有他父祖輩言行的示範，還有他主持片馬勘界等親身見聞經歷的因素。從革命成功後李根源在整理鄉邦文獻事業上的成就看，他的地域民族主義的思想在革命初期起到了推動他參加革命並提升其地位的作用，但在此後，李根源卻並未隨著社會政治思潮的更新去進而關心幅度更廣的新問題。

關鍵詞：李根源、滇籍、明臣、清末民初、民族革命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引言

雲南騰越人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是曾參與同盟會籌建(1905)、領導雲南重九起義(1911)，支持孫中山興兵討袁(1913)及參加護法軍政府(1918)的國民黨元老。1908 年，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正在青森步兵第五聯隊充當見習士官的李根源，完成了他自 26 歲赴日本留學前即已著手的選編滇籍明臣著作之事，輯成了收錄楊一清(1454-1530，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孫繼魯(1498-1547，字道甫，號松山)、[1]楊繩武(1595-1641)、傅宗龍(1610 年進士)、王錫袞(1598-1647)等五位明代雲南籍士夫著作的《明滇南五名臣遺集》。[2]這年他 30 歲。學成回國後，1911 年李根源將此書與收錄雷躍龍(1602-1661)、胡璿(1457 年進士)著作的《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一同刊刻於雲南。選輯並刊刻鄉邦明臣著作之舉，對剛及而立之年的李根源而言，明顯別有期待。他並未將留日所學的內容作為宣揚傳佈的主題，而是將目光回溯，盡心於整理舊籍；而且，他顯然不止於純做文獻的輯佚和編纂工作，而是要賦予所編排之文字以時代的用意。

這樣的訊息，來自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將《明滇南五明臣遺集》收錄著作的五位先賢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教育家、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澤諭吉(1835-1901)，和被稱為「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1828-1877)，作比較之後的一段感言，他說：

> 根源亦嘗涉獵東西歷史及世界名人記錄矣，其間足以濬發吾智識、開拓吾心胸者，實繁有徒，而精神之感發，終無如諸

1 有關孫繼魯的生平研究，參見馬壽千，〈明代著名清官孫繼魯事略〉，頁 127-129。

2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卅四年條，頁 365。

> 公之於我切。微諭西哲，若福澤，若西鄉，固世界所推為東亞偉人也，然自我視之恒不逮日人之親切，故觀感亦恒不逮日人。蓋觀感之道與感情相連系，非可強而致也。[3]

為李根源精神所繫者，是他心目中比福澤諭吉、西鄉隆盛等更具影響力的「諸公」，也即楊一清等五位滇籍明臣。李根源的感觸，其實由來有自：「根源自幼輒喜聞鄉先哲佚事，而于楊文襄、孫清潛、楊文毅諸公，為尤篤泊。讀《明史》至紀及傅忠壯、王忠節、馬潛烈、龔尚書諸公事略，則妄自期許，掩卷太息，曰：『男兒生世，脫下變故，顧不當如是耶！』景仰之心，由是亦切。」[4]李根源還特別提到經常會想起曾經拜謁過的楊繩武、孫繼魯等人故里或墓碑；而且，這種對故土明臣的景仰之情，比較日本人對西鄉隆盛銅像的崇敬之情，「有過之無不及也」！[5]很明顯，李根源並不因日本人眼中的兩位英雄在推動明治維新、令日本的民族革命取得勝利，以及在實現日本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迅速發展等事業上功勳卓著，[6]就認為他者的精神鼓舞力量無窮，本邦本土就相形見絀。相反，李根源堅持能調動其自身民族「精神」與感情的，還是故土故鄉的英雄。這與他強調

3 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遺集‧自序〉，頁 258 上。亦見於李根源，《曲石文錄》，卷 1，頁 1。

4 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遺集‧自序〉，頁 258 上。亦見於李根源，《曲石文錄》，卷 1，頁 1。李根源的這類感觸是當時留日學生的普遍共識。日本人的愛國精神對留日學生的影響，參見詹遜(Marius Jansen)，〈中國留日學運與辛亥革命之關係〉，頁 2006-2007。

5 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遺集‧自序〉，頁 258 上。當時留日學生對日本人藐視、譏笑中國人的簡單且直接的應對，是徑直剪去屢受侮辱，被稱為「豬尾」的辮子。參見詹遜，〈中國留日學運與辛亥革命之關係〉，頁 2007-2008。

6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呂萬和、熊達雲譯，《日本政治史》，卷 2，〈明治維新・序〉，頁 1。

以「感情」為依託者才是能牽動人之內心並能切實起到鼓舞精神作用的關鍵要素，啟發心智、開拓視野的知識性收益無法全然與之相比的思路，其實一脈相承。這段由對比而生的感言，是李根源為當年完成編纂的《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所撰序言的一部分。

類似李根源因旅居東洋而生發的故國情懷，甚至湧動民族情感的記錄，在當時並不少見。例如 1905 年元旦，宋教仁在東京淺草的公園遊覽，當看到「西洋人形活動劇」時，便心生感觸，說這些表演不僅能「發人美術之精神」，還能「鼓人愛國之思想」。[7]但李氏所感奮懷想的，是明代的鄉先賢及他們的英烈事蹟，並不止於因應情景的偶發心思，也並非對中華傳統及悠久歷史的普通感想。如是，李根源如此集中而鮮明的感情寄託與生命體驗是如何形成，因應的何種時政形勢，又是如何展現於他的言行之中？從其同類言行，是否能獲得對晚清反滿革命與抵禦外國侵略等重大時代問題及在革命中擎出明史大旗之用意的更深切理解？這是本文循著李根源輯刻這兩部滇籍明臣著作之事，所要釐清的問題。

下文將首先分析《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和《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的內容特色、編纂成因，並結合二書編選、刊刻的時代背景，提挈李根源隱於編輯事情中的現實期許。其次，聯繫他此前受孫中山、黃興鼓勵，在 1906 年與楊振鴻、趙伸、羅佩金、呂志伊等人合力創辦的《雲南雜誌》，及該刊專輯明季遺事的周年特刊《滇粹》，討論以李根源為代表的留日學生如何帶著鄉誼、鄉情，本諸守鄉衛土之職志，與革命反滿潮流自然融合並成為其先鋒力量的過程；進而從李根源曾親身參與的片馬勘界事情及與之相關的片馬問題，來看李根源藉助本土的歷史資源以鼓動民族情感，實有嚴迫的現實壓力。

7 宋教仁，《宋教仁日記》，卷 2，1905 年條，頁 21。

最後，從地域性的角度及李根源的生平經歷出發，對晚清民族主義革命過程中，宣揚明代歷史，實有不同的階段性特徵，略予引申。

二、《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和《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的內容特色與選編用意

(一)史源 ——輯錄鄉邦志史

作為一部收錄明代滇籍名臣的著作集，《滇南五名臣遺集》收錄的顯然並非原作者的全部著作。楊一清是治明史者熟知的著名政治家，在他著作的現代整理本中，除點校者有意將詩作割愛，[8]計有《關中奏議》18 卷、《西征日錄》1 卷、《制府雜錄》1 卷、《吏部獻納稿》1 卷、《宸翰錄》1 卷、《閣諭錄》1 卷、《密諭錄》7 卷、《督撫稿》及序文、祭文若干篇，再加上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 20 卷《石淙詩稿》，就已遠不止於《五名臣遺集》中題名《安寧楊文襄公集》的「文三十八首，詩五百零六首，附錄詩文十三首」了。[9]

楊一清是《五名臣遺集》中收錄詩文數量最多，篇幅最長的一位。孫繼魯《昆明孫清湣公集》收錄文 1 篇、詩 1 首；楊繩武《彌勒楊文毅公集》收錄文 1 篇、詩 5 首；傅宗龍《傅忠壯公集》收錄文 7 篇、詩 5 首；王錫袞《王忠節文集》收錄文 2 篇、詩 3 首。照李根源所說，這些入選的明臣著作，都是迭經戰火而不易得的文字。

李根源在選入楊繩武所撰〈述贈光祿寺卿楊忠節公節略〉之後，記有如下文字，說明這份文獻的來由：

> 乾隆間吾鄉李鶴峰中丞、張月槎侍御諸公，景仰忠節，因彙

8 唐景紳、謝玉傑，《楊一清集》，〈前言〉，頁 11。

9 《安寧楊文襄公集》目錄，收入《明滇南五名臣遺集》，頁 259 上。

> 刊《明史》忠義列傳、《雲南通志》及府州各志所載楊忠節傳與當時名公鉅卿闡揚忠節之作，凡百餘篇，而弁之以公傳及七律一章。迄今二百餘年，幾經兵火，而是編尚得流傳不泯。其殆有陰為呵護者歟？亟刊之以公諸世。[10]

楊繩武撰寫〈節略〉的傳主楊忠節公是楊以成，字太和，雲南路南人。〈節略〉詳細追述了楊以成在 1622 年抗擊反叛的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的英烈事蹟，[11]內容比傳主在《明史・忠義傳》中的形象更為詳盡細緻。[12]這篇文字是李根源取自李鶴峰(因陪)、張月槎(漢)精心整理楊以成事蹟的成果。李、張二人為乾隆年間的雲南籍士夫，他們從《明史》忠義列傳及《雲南通志》及各府州志中選輯楊以成的著作，已然為董理鄉先賢舊著奠定了基礎，且做出了示範。李根源所為的第一重目的，便是在這一整理鄉先賢遺澤的傳統之內，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接續著做整理地方歷史資源的事業。

作為一部整理滇籍名臣著作的文獻集，《五名臣遺集》保存戰亂之後仍然留存的先賢著述之價值，確與其性質相符合。楊一清、楊繩武雖然有文集存世，李根源選錄的，也屬作者的稀見之作，例如楊繩武除了那篇〈節略〉，他被收入《五名臣遺集》的五首詩，就不見載於其他被影印而如今常見的書中。[13]王錫袞的〈段恭節公祠堂碑〉不難見，但之後的那篇〈穀貽堂集序〉，就較為稀見了。[14]

---

10 楊繩武，〈述贈光祿寺卿楊忠節公節略〉，收入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楊文毅公文集》，頁 359 上。

11 楊繩武，〈述贈光祿寺卿楊忠節公節略〉，收入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楊文毅公文集》，頁 358 上-359 上。

12 《明史》，卷 290，〈楊以成傳〉，頁 7448。

13 楊繩武常見的著作有《鐘山書院規約》、《論文四則》等書，均不收錄李根源選輯的楊繩武詩作。

14 這五位明臣中，除了楊一清、楊繩武有文集的合刻本和單刻本，孫繼魯、

雖然《五名臣遺集》在保存文獻上有價值，但對編纂者李根源來說，卻並不是因為得到善本或是以整理古籍為職志，方才從事此事。試想當此書編纂完成時，李根源以一名留日學生的身分，能夠方便閱覽的稀見中文古籍應當有限，即使是他在 1901 年開始留心滇中文獻時，尚在家鄉騰衝，可閱讀到的古籍會比在日本多些，兩年後到省城昆明參加鄉試，[15]眼界更加開闊，但他纂輯的動機也並非是因為古籍本身的吸引力巨大。

從《五名臣遺集》的史源上略作些分析，便可見李根源在整理先賢文獻和表彰其英烈事蹟的目的之外，藉以鼓舞地域認同精神，保存並宣揚雲南文化的用意，更為明顯。而且，從推動民族革命的目的來看，這層意義要遠大於成果本身的價值。這是李根源所為的第二重，也是他選輯滇籍明臣著作的更重要目的。檢核雲南的史料可見，清代著名滇籍學者師範(1751-1811，字端人，號荔扉，趙州人)選輯的《滇系》，應該是李根源選材編輯的主要來源。對《滇系》40 卷，精研滇中文獻及史事的方國瑜評價說：「是書為藝林所重，今之言滇事者，亦莫不稱其書，于滇南史地之學，其功不可沒也。」對師範在每事之後的附論，方國瑜認為也有切要可觀者，不失為考校滇史的善本。[16]《五名臣遺集》中選錄的五位明臣，除了李根源特別交代楊繩武的〈節略〉「得自昆明李厚庵太史所藏《路南楊忠節錄》本中」，[17]

傅宗龍、王錫袞的文字至今得以存留，讀者能容易取閱，便是得益于李根源選編並刊行的《五名臣遺集》。

15 李根源，《雪生年錄》，卷 1，光緒廿九年條，頁 351-352。

16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滇系》」條，頁 695-696。對此書史料價值的評價，亦參見江燕，〈《滇系‧賦產》的史料特點及價值〉，頁 96-98。《滇系》在 1808 年修成，1887 年重刊，成文出版社在 1968 年將之縮印再版，計有 40 冊，1556 頁。

17 楊繩武，〈述贈光祿寺卿楊忠節公節略〉，收入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

其他四位作者均見於此書，且他們被李根源選錄的大部分文字，也都是從中摘錄。例如上文提到的孫繼魯，他的文集在晚清時已經不存，其被收錄於《五名臣遺集》中的〈習杜堂祠記〉，就見於《滇系》。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篇文字之後附了一段孫鵬的跋語。孫鵬是孫繼魯的六世孫，說繼魯的《松山文集》、《破碗集》經歷兵火之後不存的話，就出自他的這段跋。他並說了一番先祖學博才高，為文古道遒勁的贊詞，也如《滇系》中收錄孫繼魯〈習杜堂祠記〉的面貌一樣，被李根源附於《五名臣遺集》此文之後；惟補入的一段交代孫鵬生平經歷的文字，是根源新作的按語。[18]《五名臣遺集》中楊一清被選錄的文字也是以出自《滇系》的為主。除了有六份奏疏見於楊一清《關中奏議》，書中收錄的書柬及序文，均見於《滇系》。傅宗龍被選的六篇文字，也俱出於此書。當然，李根源也並非照錄《滇系》，楊一清的〈請修邊牆疏〉，《五名臣遺集》便捨而不錄，並不與《滇系》一致。[19]

《滇系》之所以能成為李根源據以選材的重要參考用書，不僅是因為此書的《藝文》分量頗重，在全書再版後 40 冊的篇幅中占了 18 冊，令李根源有充足的取捨空間，更由於此書是為補充《雲南通志》而作，本身便有史乘的性質及滇籍學者整理鄉邦文獻的意義。[20]況且，據李根源自撰年譜《雪生年錄》載，他早在 1901 年就詳細閱讀過《滇系》，而且從這年起，他自言便開始「留心鄉邦文獻，嗜好金

臣遺集・楊文毅公文集》，頁 359 上。

18 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孫清潛公文集》，頁 356 上-下。師範，《滇系・藝文》，第 9 冊，頁 942 下。

19 師範，《滇系・藝文》，第 7 冊，〈目錄〉，頁 845 上。

20 關於《滇系》的性質，參見洪亮吉，〈滇系序〉，收入《滇系》，卷首，頁 8 上-9 上。

石」。[21]1910 年，當英國人入侵滇西片馬，李根源受託承辦片馬防務，他從昆明出發前往滇西，隨身攜帶的書籍中，就有《滇系》。[22]

（二）用意── 表彰鄉邦明臣的衛邊事蹟與為國精神

明代的滇籍名臣並非僅限於李根源關注的上述幾位，[23]然而這幾位被李根源慎重地聚於一處，卻別有彰顯其衛邊事蹟與為國精神的用意。鄉貫為雲南安寧州的楊一清，成化八年進士，[24]一生歷歷中外五十餘年，三任陝西三邊總制，兩次入閣，在 1526 年還接替了被排擠出內閣的費宏，出任首輔。當代研究者認為他為實現嘉靖初年的社會安定、吏治清明做出了重要貢獻。[25]楊一清以邊才著稱於時，《明史》本傳稱讚他「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並引述了他任總治延綏、寧夏、甘肅三鎮軍務時上呈的建議修邊奏疏，以顯示他出色的政治才能。[26]《五名臣遺集》中選錄的〈謝總督三邊表略〉、〈整理邊務以備虜患摺子〉、〈查報

21 李根源，《雪生年錄》，卷 1，光緒廿七年條，頁 351。

22 李根源，《雪生年錄》，卷 1，宣統二年條，頁 371-372。

23 李根源曾從學術思想的角度關注其他明代的雲南籍學者，參見李根源，《曲石文錄》，卷 1，〈重刻南園漫錄序〉，頁 2。也可參見他在《雲南金石目略初稿》中收集的明代金石碑刻目錄。見李根源，《雲南金石目略初稿》，卷 2、3，共 138 頁。

24 雲南並非楊一清的戶籍所在，而是他的鄉貫所屬。《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便記楊一清的戶籍是湖廣巴陵，又引述《江南通志》，作直隸丹徒之說，還一併記錄了他的鄉貫是「雲南安寧州」。這是因為楊一清原籍是雲南安寧，他生於廣東化州(今化州)，後隨父遷居湖廣巴陵(今湖南嶽陽)，葬父於直隸丹徒(今江蘇鎮江丹徒縣)，之後便定居於此。參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頁 1655。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 1，頁 433。

25 關於楊一清的生平，參見唐景紳、謝玉傑，《楊一清集》，頁 1-4。

26 《明史》，卷 198，〈楊一清傳〉，頁 5225-5231。

虜情摺子〉等文，也都是楊一清有關邊事的疏請。毫無疑問，楊一清是明代在穩定邊事與治理邊疆事業上頗有成就的滇籍名臣。

雲南右衛人孫繼魯是 1523 年進士。李根源未採用他在《明史》中的本傳，而是將直隸任丘人龐凱(1657-1725)為他撰寫的傳記，冠於《孫清湣文集》之首。這篇傳記也見於《滇系》，或許正因如此，才被李根源選錄。[27]龐傳比〈明史・孫繼魯傳〉略去了傳主在 1547 年山西巡撫任上，因反對當時的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而與萬達不諧，加之此前與大學士夏言不和，因此下詔獄，最終「疽發於項」而死的事，[28]卻突出了繼魯在巡撫任上熟悉虜情，並上「籌戰守之議十六條」的邊才。其次，龐傳還全文引述了繼魯在詔獄中與著名的忠介之臣御史楊爵(1493-1549)唱和的詩：「憂國憂民意自深，諫章一上淚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留取芳名照古今。」楊爵的和詩，被引述了兩句：「勸君努力加食飯，浩蕩乾坤在兩肩。」[29]第三，龐傳文末比〈明史・孫繼魯傳〉多引了明穆宗制文諭祭的一段文字：「(繼魯)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汙之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屈之貞。賢聲每著於在官，清望雅歸於輿論。特以籌邊之議，恥於苟同，乃來文致之辭，陷於重譴。式嘉素履，特介新恩云。」[30]這樣的取捨，對於表彰繼魯熟悉邊事，富有時望，並得到朝廷贊許的意思非常明確。

楊繩武是 1631 年進士，曾在順天巡撫任上抗擊清軍，後卒於豐潤，在守禦疆土事情上，忠直而有氣節。傅宗龍是 1610 年進士，歷

27 師範，《滇系・藝文》，第 5 冊，頁 795 上-796 上。

28 《明史》，卷 204，〈孫繼魯傳〉，頁 5384-5386。

29 龐凱，〈孫繼魯傳〉，收入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頁 355 上-下。

30 龐凱，〈孫繼魯傳〉，收入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頁 355 下。

任貴州巡按、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進本部尚書，其間仕宦雖有起伏，卻能始終盡忠守職，在抗擊土酋特別是平定安邦彥叛亂中立有戰功，後抗擊李自成、羅汝才部，死於項城，且死時頗為勇烈，是一位在處理邊務和軍事作戰方面頗有才能的著名官員。[31]王錫袞是 1622 年進士，歷任禮部右侍郎、左侍郎，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史》本傳記載了他敢於直言的形象，李根源則另附了一篇名為〈明季忠烈錄〉的傳記於《王忠節文集》卷首。傳文不僅記述了他替在抗擊清軍中蒙冤的袁崇煥申訴，推舉盧象升辦理邊事等防禦滿清的故事，還細說了他在被土酋沙定洲俘獲後因不從而遇害的事蹟。他的忠烈形象，因而得以更為突出。[32]

因看重作者的英烈事蹟而選錄其文字，同樣是《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的選編宗旨。李根源在此書的跋文中，細說了得到雷、胡遺文的因緣及刊刻的緣故。二人著述得自李根源的同里人尹藝的遺集。尹藝是道光甲午科的舉人，其「詩文豪邁，慷慨吊古，於勝國遺賢佚事、詩、史尤詳」。當「杜逆之亂[按：即 1856 年爆發的杜文秀起事]，先生死難鵝腦山」，結果文集散失，李根源僅得到了三冊鈔本，欲行刊刻。[33]其中就有雷氏隨永曆帝到雲南，途中失散，不得已隱居於騰越雪山的事蹟。與他一同隱居的還有宦遊三人與騰士三人，即南京周東華、南昌徐宏泰、無錫蕭道明、騰越葉奕、騰陽段真與吳茂桂。此外另有隱居寶峰山的李根源鄉先賢胡二峰。李根源於是與湘

31 《明史》，卷 262，〈傅宗龍傳〉，頁 6775-6780。

32 《明史》，卷 279，〈王錫袞傳〉，頁 7150-7151。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王忠節傳》，頁 372 上-下。

33 時為同治六年(1867)，事見李根源，《曲石文錄》，卷 3，〈尹虞農先生〉，頁 3-4。

西黃膺一道，摘錄了雷、胡二人的著作，彙編成集。[34]

雷石庵即雷躍龍(1602-1661，字伯麟)，1619 年進士。他被輯入的第一篇文章是為楊一清撰寫的〈石淙楊文襄公傳〉。這篇傳記對「文襄之道德、文章、政事、忠義，言之親切詳至，足補國史所遺、省志漏載」，故而從《新興州志》中鈔出。[35]胡二峰即胡璿，騰越西街人，1634 年進士，後隨永曆帝至緬甸，隱居寶峰山。1911 年春，李根源歸省，與里人一道尋訪胡璿遺著，獲得「碑四、詩二、聯三、額一」，便將所得與雷躍龍的遺集合刊，以追憶這兩位「職位同、遭際同、晚節亦同」而至今為騰越人欣慕的勝朝守節之臣。[36]

細審李根源編輯兩書的文獻來源與這七位明代滇籍名臣生平的共性及特點可見，李根源動議輯佚並刊刻其文字的宗旨明確，且選擇審慎，目的即是爲宣揚本邦明代名臣在抗擊武力外侵者、保疆衛土上的勇敢與才幹。七人擅長邊事，精忠報國，堅守臣節而不惜犧牲個人的共性在此二書中得以彰顯，根源的言下之意即是，這種精神在雲南一地古已有之，且在明代不乏其人。

那麼，他在 1908-1911 年間比較集中地搜集並刊刻這些明代名臣的著作，除了有個人重視和同道協力之外，是否還另有基於他見聞經歷而必然為之的因素呢？要解釋這一問題，李根源在 1900 年代投身同盟會並成為雲南革命青年核心人物的經歷，以及他在 1908 年受託輯成與上述二書性質類似，但內容不同的《滇粹》，便需要首先納入本文分析的視野。

34 李根源，《景邃堂題跋》，卷 1，〈雷尚書殘集跋〉，頁 5。按：此條寫於宣統元年六月。

35 李根源、黃膺，《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頁 238 上-下。

36 李根源，〈胡二峰遺集序〉，收入《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頁 248 上。

三、興辦《雲南雜誌》與選編特刊《滇粹》

(一)參加革命與編輯《雲南雜誌》

李根源早年的滇南鄉間生活，決定了他最初的人生抉擇是走考科舉進而入仕途這一傳統的士子成才道路。據李根源回憶，1901 年他開始留心鄉邦文獻、嗜好金石，其內容從他記錄當年閱讀的滇籍文獻及次年研習的傳統文史書籍看，的確是包含了在傳統學術體系裡人才培養的必讀書與熟悉鄉邦文獻的必看書。[37]只不過，這種理想很快隨著時代的大變革，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下面先分析他順應著變革的時代風潮，投身於革命排滿事業的過程。

1903 年李根源離開家鄉，準備到省城昆明參加鄉試，在得知清政府已經推行教育改革，廢黜八股文後，即報考了雲南高等學堂並被錄取。與他一同錄取的騰衝籍考生，僅有好友李曰垓(1881-1944，字梓暢)一人。[38]李根源晚年雖然自歎「年已半百，猶為不通之人」，暢達于文史之學這一傳統中國對社會精英的要求，可能仍是他難以企及的人生目標，但李根源卻走出了另一條革命家的道路。[39]

進入雲南高等學堂之後，李根源的眼界日漸開闊，通過接觸當時流行的革命報刊和書籍，耳目也為之一新。他與李曰垓、羅佩金、趙伸等一道，委託曲靖的李仲鏡購買宣傳革命的書籍《旭書》、《革命軍》、《新湖南》、《清議報》、《新民叢報》等閱讀。[40]這類報

37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廿七年、廿八年條，頁 351-353。
38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廿九年條，頁 353。
39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廿八年條，頁 352。
40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廿九年條，頁 353。按：《旭書》是光緒廿五年(1899)在蘇州付刻。

刊對李根源來說，並不會太陌生。因為早在 16 歲時，李根源之父李大茂就為他訂了上海的《新聞報》，[41]要求他逐日閱讀，[42]這一庭訓養成了他獲取新知並關心時政大事的習慣，當然也利於他日後接受新事物。受這些書報宣傳的革命思想影響，李根源漸而有了革命反滿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恰與他次年赴日留學的見聞配合了起來。

1904 年，26 歲的李根源參加雲南舉行的官費留學考試，考送日本學習陸軍。[43]從當年十一月抵達東京開始，[44]到 1909 年返國，其間李根源先後在日本附屬於參謀本部的振武學校和為培養士官的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45]當時青年學生留日之風正盛，[46]1903 年更是留日學生中反清革命思想和改良保皇思想發生分化的時期。[47]這樣的氛圍，為李根源轉而投身革命，構成了正面的推動力量。

到達日本之後不久，李根源便與孫中山(1866-1925)、黃興(1874-1916)等革命黨人有所接觸並參與了同盟會的組建。1905 年四月，李根源先在東京拜會了黃興。[48]六月，得知孫中山先生在橫濱，李根源便與

41 有關李大茂的生平，參見李根源，《曲石文錄》，卷 3，〈先考蔚然府君行述〉，頁 11-13。

42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二十年條，頁 345。

43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三十年條，頁 354。

44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三十年條，頁 355。

45 有關這兩校的情況，分別參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93-96、27。

46 有關清季留日學生的情況，參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59-67、77-83。據稱從 1900 年起，每年有上百人赴日留學，到 1906 年達到了每年上萬人。李喜所，〈辛亥革命前後的留日學生運動〉，中華書局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606-607。另一說是由 1901-1910 年間，中國留日學生共達 32,428 人。參見王振輝，《中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清末民初知識份子的困境與抉擇》，頁 139。

47 李喜所，〈辛亥革命前後的留日學生運動〉，頁 631。

48 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頁 1。

楊振鴻、羅佩金前往拜見，與在座的頭山滿(1855-1944)、宮崎寅藏(1871-1922)、陳天華(1875-1905)、匡一(1876-1920)、劉揆一(1878-1950)等人相談甚歡。[49]七月三十日，孫中山聯合在日本的留日學生與旅日華僑，舉行了同盟會籌備會，起草了同盟會章程。[50]八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李根源自言「同盟會成立，余與焉」，[51]並成為「同盟會第一次開會簽名單三十七人之一」。[52]其後，陸續加入同盟會的雲南籍留日學生有呂志伊、楊振鴻、趙伸、羅佩金等 47 人。後經楊振鴻在昆明、騰越、緬甸介紹入會的滇籍人士達二三百人。[53]以滇籍留日學生為重要組成部分的雲南革命青年群體正在形成，李根源及其好友呂志伊、楊振鴻、趙伸等人，成為了這一群體的奠基者和核心人物。

同盟會成立後，此前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在東京創辦宣傳反清革命的《二十世紀之支那》以為機關刊物，後改名為《民報》，於1905年11月26日在東京正式發行。[54]從中國各地來日留學的學生，也陸續創辦宣傳革命的報刊，以配合並鼓動革命。早在 1903 年，湖北留日學生就創辦了激進的學生刊物《湖北學生界》，浙江籍的學生同年也辦起了《浙江潮》。1906 年湖南籍留日學生陳家鼎在東京創辦《洞庭波》月刊，宣揚革命。1907 年 8 月，陝甘籍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秦隴》月刊，發行一期後改名為《關隴》，繼續出版。同年，吳玉章在東京創辦了《四川》。1908 年江西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了《江

49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卅一年條，頁 356。

50 參見《孫中山年譜》，光緒卅一年條，頁 68-69。

51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卅一年條，頁 356。此時正是反清思想成為留日學生思想之主流的階段。參見李喜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學生運動〉，頁 632-633。

52 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收入《雲南雜誌選輯》，頁 1。

53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卅一年條，頁 357。

54 《孫中山年譜》，光緒卅一年條，頁 71-72。

西》月刊。這些與李根源提到的《新世紀》、《漢幟》、《鵑聲》、《江蘇》、《湖北學生界》等刊物及《革命軍》、《虜書》、《天討》、《揚州十日記》等單行本，構成了當時宣揚革命的重要書報陣地。[55]

興辦宣傳革命思想的報刊是當時民主革命家推行革命的重要手段，但在 1902 年上海「蘇報案」之前，[56]由於改良派在辦報宣傳上佔據上風，宣揚革命的報刊並不佔優勢。在十九世紀末，興中會成立初期，用於宣傳的工具，「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及選取《明夷待訪錄》內原君、臣單行本數種」，但康有為等所辦的《橫濱清議報》、《新民叢報》、《神戶亞東報》、《新加坡天南新報》、《檀香山新中國報》、《三藩市文星報》、《紐約維新報》、《澳洲東華新報》等報刊居於絕對優勢，佔有話語權。對比保皇派報刊的興盛，革命黨認為自己已居於下風，[57]特別是「素恃為興中會地盤之橫濱、檀香山二處，竟為保皇黨所奪」。因此孫中山在 1899 年派陳少白到香港組織《中國日報》，開始以興辦革命報刊為手段爭奪宣傳陣

55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卅一年條，頁 357。是年李根源 21 歲。有關清末留日學生所辦的報刊，參見徐志民，〈晚清中日關係中的留日學生報刊問題〉，頁 24-32。楊海平、李剛，〈清末留日學生報刊述論〉，頁 79-80、23。據統計，從 1900-1918 年間，在中國國內與國外各地區出版的定期刊物，達七、八百種之多。不惟數量，出版刊物的增長幅度，也十分可觀：1890 年中國的通俗期刊有 15 種，1898 年增至 60 種，到 1913 年已增至 487 種。參見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 1 集，頁 1。有學者認為，屬於商業出版範疇的新型報刊的大量發行，有利於促成民族主義的興起。參見 Stephen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p. 3, n. 11.

56 有關「蘇報案」的研究，從歷史學角度的研究，參見王敏，《蘇報案研究》；從法制角度的研究，參見徐中煜，《清末新聞、出版案件研究——以「蘇報案」為中心》。

57 特別是當時孫中山的影響還不足以壓倒改良派的力量。參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54。

地。光緒廿六年之後，「東京留學生漸濡染自由平等學說，鼓吹革命排滿日眾，《譯書彙編》、《開智錄》、《國民報》繽紛而起」，《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蘇》等以各省留日學生為主要辦刊力量的新興月刊，也逐漸形成勢力，直至「蘇報案」，宣揚革命的書報出版，達到全盛時期。[58]

李根源受同盟會指派，很快加入到以辦報為手段來宣揚革命的行列中。1906 年 1 月，同盟會開會之後，孫中山、黃興約見楊振鴻、趙伸、羅佩金、呂天民和李根源等人，提出辦《雲南雜誌》的要求。據李根源日後回憶，孫、黃提出雲南需要興辦刊物是為了適應當時對內反滿、對外禦侮的形勢，孫、黃說：「雲南最近有兩個導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貪汙，如丁振鐸、興祿之貪汙行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緬甸，法占安南，皆以雲南為其侵略之目標。滇省人民在官吏壓榨與外侮侵淩之下，易於鼓動奮起。故籌辦雲南地方刊物為刻不容緩之任務。」李根源等人對孫、黃的意見「完全接受，決定立即進行組織工作與籌款工作」。1906 年，雲南雜誌社在東京成立，李根源以雲南同鄉會會長的身分與趙伸共同出任幹事，負責全部工作。[59]

1906 年 10 月 15 日，《雲南雜誌》創刊號出版。雜誌遵循孫、黃提出的辦刊宗旨，專注于雲南當時嚴峻的內外政治形勢，宣傳革命精神，鼓動雲南的革命力量，在「揭露清朝政府之貪汙腐化與帝國主義國家之侵略野心」上頗有成績，以致遭到清政府的敵視。雜誌社在

58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革命初期之宣傳品〉，頁 10-11。特別是《國民報》的發刊，可見留日學界的風氣已漸漸趨於革命。參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59-160。

59 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收入《雲南雜誌選輯》，頁 1-2。

滇的行銷人員李貞白等人被逮捕，學生被禁止閱讀《雲南雜誌》；[60]刊物的刊行，也因受到緊張政治情勢的影響而屢屢遭停。1908 年 7、8 月間，《民報》被日警查禁，並因此停刊，《雲南雜誌》受其影響，也一度停刊；復刊後又因為炸彈案再度停刊。後得到了宮崎寅藏的幫助，才得以復刊。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最終停刊。

當時留日學生創辦的各類宣傳革命的雜誌，由於資金短缺、刊物穩定性不足和清政府查禁，持續的時間均不長，[61]《雲南雜誌》卻能刊行5年，發行23期，這顯然是非常突出的成績。[62]在宣傳反滿的刊物中，《雲南雜誌》僅位列出刊 100 期的旬刊《清議報》、出刊 96 期的半月刊《新民叢報》和出刊 24 期的《新小說》之後，在清末出版的各種學生刊物中，居於出版數量和持續時間的前列。[63]

李根源認為，《雲南雜誌》之所以有出版佳績，得益於三方的支持：同盟會員、非同盟會員和旅京、旅各省與僑緬、僑越的滇人。[64]其中分佈於各地的滇籍人士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支持力量。這便能夠解釋，為什麼在《雲南雜誌》發刊一周年紀念會上，決定刊出以與雲南有關的明代名臣傳記為主要內容的《滇粹》，作為紀念特刊：此舉實是將凝聚滇籍人士的鄉誼、鄉情與鼓吹民族革命兩者結合了起

60 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收入《雲南雜誌選輯》，頁 2。

61 楊朕宇，〈1905 年早期留日學生刊物速亡原因評析〉，頁 144-145。具體的例子，可參見宋教仁在日本興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報在 3 月 19 日便以各社員股金未交，文稿不能收齊而遲遲不能出版。宋教仁開會商討此事，編輯陳星台起辭所負編輯之任，「眾人皆氣短焉。直至午正，迄不得一良法而散」。宋教仁，《宋教仁日記》，1905 年 3 月 19 日條，頁 47。而此時距該雜誌創辦僅兩月。見宋教仁，《宋教仁日記》，1905 年 2 月初 8 日，頁 23-24。

62 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收入《雲南雜誌選輯》，頁 2。

63 參見楊海平、李剛，〈清末留日學生報刊述論〉，頁 79-80。

64 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收入《雲南雜誌選輯》，頁 5。

來。很明顯，《滇粹》不僅能為我們更準確地把握李根源著手編纂滇籍明臣著作的動機提供資訊，也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理解《五名臣遺集》與《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在動議編纂時被賦予的意義。

(二)《滇粹》的編纂與特點

決定編纂《滇粹》是光緒 1908 年的事。雲南雜誌社在當年元旦東京舉行周年慶祝會，會上李根源與呂志伊被公推編輯紀念特刊《滇粹》，當年 8 月，完成編輯並且出版。《滇粹》的編纂理念與選文原則，在呂志伊與李根源擬定的〈凡例〉中有所展現。

《滇粹》之凡例共四款，其中第 2、3 款說明選錄古籍的版本情況：原書或有蟲蝕模糊之處和圈點痕跡，編輯者一仍其舊，不敢臆斷，也不敢妄自著墨。第 1 款和第 4 款都是可見編者輯錄此書時的心境與政治關懷的。第 1 款說書中文獻是「得自滇中藏書，或北京舊書肆，或日本圖書館，或滇黔蜀湘浙贛人士抄錄惠寄者」；編纂此書，則是為了展現「前人一片苦心」及「當時一般慘狀並雲南與全國之關係」。這明顯是將雲南一地的視角放射至全國幅度的感言，用意在以歷史關照現實，以引起讀者對當前國家危難的關心。第 4 款強調了整理雲南歷史的重要性，引發讀者思考的目的更為明確：

> 滇中歷史上之記載，最足為吾人可歌可泣，可驚可痛者甚多。此特近數月中所搜集而得者。我同胞篤愛歷史之本性，誰不如我，獲此拱璧，其狂喜當何如？悲憤當何如？感想當何如？必以其出現太晚，搜集尚少為恨。[65]

既然李根源等編纂者的根本用意在借古喻今，那麼循此思路，

65 李根源、呂志伊輯，《滇粹》，〈凡例〉，頁 2。

「狂喜」之處或是可為讀者的行止所本，「悲憤」或是為當時的憂患國勢而感發，「感想」恐怕是指應當思考該如何借鑒歷史上所見的可歌可泣之事來應對形勢。更根本的目的，當是以強化地域觀念，突出保衛故土故鄉的重要性，來替代已經成為革命對象的國家觀念；以明代歷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蹟與思想，來衝擊滿清統治權。

〈凡例〉寫於 1908 年 3 月 18 日，8 月，《滇粹》印行，聯繫李根源在 12 月為《五名臣遺集》撰序之事，可將編纂《遺集》視作他在《滇粹》「凡例」中提到的「海內藏書家後如有此類紀載，冀割愛寄賜，當以次彙集，再行續出」的落實舉措。[66]再將李根源在 1910 年為輯刻的《雷石庵文集》撰跋的事情結合來看，[67]這三部著作的選編，便構成了一個表彰明代雲南有抗擊外侮、抵禦入侵之實力與精神的完整體系。

但從內容上看，《滇粹》與李根源輯成的兩部明臣著作遺集又有不同。《滇粹》收錄的主要是在抗擊外敵、平定內亂、耀威異域等事情上與雲南有關的明臣傳記，但傳主並非都是滇籍人士，曾在雲南為官者，也被包含其中。如〈騰衝參將鄧子龍傳〉的傳主鄧子龍，是江西豐城人，曾任雲南永昌衛參將，是援朝抗日作戰的名將；傳記作者失名。〈金滄副使楊畏知傳〉的傳主楊畏知是陝西寶雞人，崇禎中曾任雲南副使，平定過楚雄土官叛亂；作者是雲南楚雄李天秩。《滇粹》裡收錄了的文字，《五名臣遺集》和《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不再二次入選。(《滇粹》目錄參見文末附錄)

由於收錄的文體劃一，《滇粹》的宗旨非常明確，即取錄的人物都能投射到應對當時排滿和禦外的雙重目的上。這一編選主旨，多

66 李根源、呂志伊輯，《滇粹》，〈凡例〉，頁 2。

67 李根源，〈明新興雷石庵尚書遺集〉，收入《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卷首，頁 233 上-下。

見於李根源在傳記之後間有的按語。如在選錄的王思訓〈明遺老熊元仲先生傳〉之後，李根源引述了熊元仲推卻朝廷徵辟的話：「吾籌滇非籌身也，又非為興朝籌也。」隨即附按語，說：「先生捨身仗義，貞介不二之衷，如日中天，昭然若揭，非今之托詞救國救民而實則利用吾民以效忠異族、攫取富貴利達之徒所得而藉口者也。」[68]書中所見對滿清的敵視，是直接從清廷禁毀文獻的文化政策給保存雲南地方文獻帶來損失的角度說。李根源在〈王永齋鳥私泣集序〉後附的按語中寫道：

> 《鳥私泣集》、《狩緬紀事》及王先生[按：王思訓]之《痛哭滇南記》三書，俱於乾隆二十九年，被雲南巡撫及湖廣總督先後以其語涉狂吠，奏繳焚毀。事載四庫館書目。茲何幸獲此序文。文季先生其不朽矣。康、雍、乾間所銷毀查禁之書，為近人複行搜出，續刊行於世者已不少。兩先生之貞魂毅魄其有靈耶，當能呵護一二，以應今日予後生小子之徵求。[69]

《滇粹》在抵禦外國列強勢力方面的特色，還見於李根源在動議編纂《滇粹》的《雲南雜誌》周年紀念會上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他說：「對本報之真正紀念，在於廢除七府礦約，收回滇越鐵路，築成滇蜀、騰越鐵路，地方自治，教育普及，國民皆兵，及農工商礦林立，英法人之勢力非趕出於紅蚌河、紅河以外不為功。」[70]這完全符合《雲南雜誌》提出的地方自治與宣揚民族主義的宗旨，與下文即將分析的英、法入侵雲南和片馬問題帶來的嚴峻形勢，也極吻合。

類似李根源編輯明代文獻以照應時事的做法，在當時雖然並不鮮見，例如 1903 年留學日本的田桐(1879-1930，字梓琴，號恨海，湖北蘄陽

68 李根源，〈昆明王永齋(思訓)明遺老熊元仲先生傳〉，收入《滇粹》，頁 88。
69 李根源，〈王永齋(思訓)鳥私泣集序〉，收入《滇粹》，頁 72。
70 李根源，〈雲南雜誌選輯序〉，收入《雲南雜誌選輯》，頁 3。

人)就曾「編明遺老所記佚事及清代嚴禁各書」，命名《亡國慘記》出版，章炳麟為之題詞，此書出版後，曾風行一時，[71]但《五名臣遺集》、《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與《滇粹》不僅在內容上互有配合，而且在出版上形成了連貫的一體，則是李根源編纂諸書的特色所在。將《滇粹》與當時留學越南的滇籍學生為揭露法國侵略雲南的陰謀，警告雲南人民而出版的《滇話》、《雲南警告》等書刊略作對比，它的這一特點更為明顯。[72]

《雲南警告》的出版目的有三：「一恐父老不信法人謀滇之急，而不急發熱誠，致蹈安南亡國覆轍；二恐父老既信法人謀滇之急，而不善用熱誠。或出於野蠻暴動，以自速滅亡；三恐父老既容納某等[按：即作者]之言，而知善用熱誠，然有時又存苟安心，存推諉心，終不能不愛錢、不惜死之志，以救危亡。」進而提出如下主張：「一、宜救地徵兵，自成一大鎮也。一、宜續派出洋學生，學習陸軍員警實業諸學也。一、宜團結一會，互相勉勵，無用法人紙幣也。」[73]《滇話》刊登的文章，也是以喚醒民眾、宣揚民主思想為宗旨，如〈睡著了的同胞快醒〉、〈滇亂紀事〉、〈河口起義〉等。這些文章的論點，與《雲南雜誌》頗具共識，因此才有《滇話》在 1910 年歸入《雲南雜誌》之舉。相形之下，《滇粹》則是以宣揚滇籍歷史名臣的角度，對鼓動革命排滿的《雲南雜誌》做了補充，令革命的思想基礎，在地域元素中又滲透進了歷史元素，運用滇籍人士對家鄉

71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 2 集，〈水牛將軍田桐〉，頁 147-148。

72《雲南警告》是留越學生為揭露法帝國主義陰謀，警告雲南人民的宣傳刊物。全文見《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頁 3-13。評論參見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雲南警告》條」，頁 588-589。

73 雲南留越學生，〈雲南警告〉，收入《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頁 3-4，11-12。

的自然眷戀與對家鄉故事的固有熟悉，將領土與國民這兩種構成現代國家的必要元素，用時間和空間結合起來，用以對抗代表革命對象的滿清統治下的清帝國。

綜合上文所述，試對《滇粹》的性質及與李根源編纂的兩部滇籍明臣遺集的關係，作如下總結：作為同盟會推動發行的《雲南雜誌》的衍生物，《滇粹》由李根源與呂志伊共同主持出版，它與李根源以私力編纂的明臣遺集有明顯的相似性和內容上的連貫性，並在宣傳滇籍明臣的愛國精神和衛邊事蹟上互成體系。《滇粹》的刊出，不僅是對《雲南雜誌》作內容上的補充，它將雲南歷史上的氣節名臣與他們抵禦外侮的事業聯繫起來，更能夠從歷史的角度，令讀者回憶起鄉先賢們的業績，調動起雲南人的民族感情與歷史情緒，達到鼓吹民族革命的目的。只是因為《滇粹》以收錄明臣傳記為體例，在內容上有局限，李根源選編七位滇籍明臣著作之舉，便是以保存其文字的形式，突出了他們在言論之中所見的精神。透過他們的文字，編者希望讀者能更直接且切實地體會作者自強無畏的精神之所系，達到更充分地鼓動革命的目的。

四、現實關照

李根源藉輯佚並整理明代歷史上滇籍名臣的著作，來展現他們為維護國家利益而堅守邊疆且勇於其事並有業績的共性，在雲南遭受英法勢力入侵形勢嚴峻的 1900、1910 年代，實有著關乎地方安全甚至國家命運的現實考慮。下面，我們本諸李根源的見聞經歷，分述當時雲南遭受英法入侵的危急形勢、滇南李氏在抵禦外來侵略上的作為和李根源辦理片馬防務的經過三個問題。

(一)雲南受英、法入侵的形勢

在 1900 年代，雲南已經成為英、法勢力進犯中國的首要之區。而法國謀滇之急與謀滇之真，已為時論所共識。1906 年，雲南留越學生發表〈雲南警告〉，翻譯了巴黎出版的《雲南遊歷記》的序言，從引述的文字看，法國覬覦雲南之心，十分直白：

> 攻守形勢之外，雲南之氣候溫和，猶似法國南境，於法人尤為相宜。其礦田之富，物產之饒，較諸越南，奚啻霄壤。借沃壤之餘，以養瘠地之不足，此雲南所以不獨為越南之屏藩，而且為越南之倉庫矣。美哉！雲南也……
>
> 茲當日本新役之後，財力空乏，休養為先，不能他顧。誠為吾法經營雲南絕美之好機會。吾望他日火車遊行雲南時，吾法之權力隨之而達於雲南全省。吾尤望雲南鐵路告成之日，能在日本休養未足之先，則席捲雲南，如探囊取物矣。[74]

此事是在李根源完成編纂《明滇南五明臣遺集》的兩年前。1907 年，刊登於《雲南雜誌》第五號上，題名〈論雲南對於中國之地位〉的文章對雲南受英法勢力侵佔的過程，又做了如下述評：「自 1883 年越南淪亡於法，而雲南即有唇亡之虞。1885 年，緬甸折入於英，而雲南更成犄角之勢。自是以降，兩雄交伺，……而有滇、緬畫界，蹙地千里之事。未幾而有攫滇越鐵路建築權之事。未幾而有攬七府礦山開採權之事。未幾而有雲南兩礦不許割讓他國之事。藩籬盡撤，深入堂階，而雲南遂劃入英法之勢力範圍。」該文署名「無己」的作者進而說：「今法人之意，謂非取雲南不足以鞏固越南之根據地也。既得雲南，又謂非取兩廣、四川不足以鞏固雲南之根據地也」，

74 雲南留越學生，〈雲南警告〉，《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頁 4-6。

且「法人若襲取雲南，伸手於珠江流域，則英人將佔領揚子江流域，德人將佔領黃河流域，日人將北取燕薊，南取浙閩，俄人亦佔領陝甘，以圖限制。而吾國遂山河破碎，豆剖瓜分，為各國之新領土。此又持帝國主義者之勢力平均所必至之結果也」。故而，作者極陳，從狹義言之，雲南為雲南人之雲南，其存亡與否，雲南人自有受庇、罹殃之別；從廣義言之，雲南則為中國之雲南，「其存也可為中國之遮罩，其亡也即為中國瓜分之動機」。[75]這並非危言聳聽，而幾乎是當時關注雲南存亡者的共同觀感。[76]

在這種環境下，李根源面對時事的感言，一如其他關心時局者所共有而更具出自軍人敏感的特殊感受。1910 年，滇越鐵路通車。在舉行通車典禮的當天早上，身為雲南陸軍講武堂監督的李根源向同學們發表演說，在提及他對此事的感受之外，還明白指出身為軍人，當有守土衛國之責。據當事者後來回憶李根源現場演說的大意是：「法國今天將滇越鐵路修抵昆明，我們國家不惟修不起鐵路，甚至將國家主權拱手送給外國人。我輩軍人，有守土衛國之責，大家在學應該努力學習，將來誓必雪此恥辱。今天放假一天，作為紀念。希望大家牢牢記住今天，放假後可到火車站去看看。」據當事者說，李根源講話時「慷慨激昂，講到痛心處，不禁痛哭流涕」，「這一天的印象，深深留在每個人的腦筋中，當時情景還歷歷在目」。[77]此番話中李根源說的軍人當有守土衛國責任的話，當是其切身感言。李根源不僅此時是雲南講武堂的監督，此前在日本留學，也是

75 無己，〈論雲南對於中國之地位〉，收入《雲南雜誌選輯》，頁 312-315。

76 參見楊兆麟，〈籌滇協會發刊詞〉、唐琭，〈籌滇篇〉，分別收入楊毅廷編，《滇事危言》，初集，頁 16-17，19-24。

77 素庵、適生，〈雲南陸軍講武堂的概況〉，收入《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頁 16。

入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於是當他面對桑梓陷入安危及國家利益受到外國侵犯時，他對作為職志的軍人職責，便有了更為切實的體會。他激昂和痛心的表現，便無疑是出於自然的情感表露。

況且，當時雲南面臨的外國勢力侵入，尚不止鐵路修建權被搶奪一項。1907 年《雲南雜誌》上呂志伊以「俠少」之名發表的論文〈論國民保存國土之法〉，即專就「鐵道」、「礦產」、「邊界」、「商埠」等項，析論外國勢力侵入的事實以及國民無力自保生計，政府無力保衛國土、主權的種種危機。此外清廷並不顧雲南地方利益，屢屢屈從於外國勢力，令雲南的地方安全更為危急。[78]政府的決策及外國入侵的事實，使得雲南地方革命力量勃興，保衛雲南以抗外禦侮的呼聲也日高。

是故，李根源在 1911 年以刊刻滇籍名臣文集來表彰他們英烈事蹟的行動，可見是應時而有根基之舉。他在當年元旦謁王錫袞祠墓之後所發的感慨道：「公之勳烈， 在史冊，炳若日星，區區文字傳不傳，又何關輕重哉！第以根源景仰鄉先賢，見聞所及，雖片紙隻字，亦不敢聽其淹沒」，也算是實有所指之辭。[79]李根源此說，也印證他對這幾位明臣英烈故事的景仰，要勝過自己保存其文字本身；輯錄他們的遺文，恰是為了更明確地張揚其事蹟，展現其盡忠為國和不畏外侵強敵的精神，為投身革命的同道提供足可藉以喻今並勵志的歷史資源。這段識語被作為附記，置於〈王忠節傳〉之後。

78 俠少，〈論國民保存國土之法〉，《雲南雜誌》，1907 年第 3、6 期，後收入張枏、王忍之主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頁 825-831。

79 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王忠節傳》所附識語，頁 378 上。據《雪生年錄》，李根源謁墓是在宣統三年元旦，撰寫識語是當年 4 月 28 日，可知《五名臣遺集》刻成，是在該年四月之後。參見《雪生年錄》，卷 1，宣統二年條，頁 372。

（二）滇南騰衝李氏

李氏自遷入雲南，定居騰衝，便是望族。遷滇始祖李德相傳是1381 年隨沐英定雲南的軍隊到達此地，後因軍功世襲雲南前衛千戶。到了第十世李鎮雄(字鐘英)，官至都指揮僉事，封武略將軍，後「扈從永曆帝奔緬甸，至蠻暮，與帝相失」，只得定居曲石，[80]但規定子孫勿仕清朝。[81]

李根源之父李大茂，字蔚然，曾任藍翎都司銜儘先補用守備，騰越鎮中營千總，對雲南邊境地勢十分熟悉，尤其對道里扼塞瞭若指掌。[82]李根源「所以知形勢險易者，由君故也」。[83]李大茂不僅熟悉邊務，還一直親身參與勘察滇緬界務和地區防範，曾在 1884 年跟隨遊擊李珍國駐紮緬甸蠻暮，上書請援緬甸。[84]1890 年 6 月，李大茂奉總兵張松林轉奉的總督王文韶之命，勘察滇緬界務，深入到木邦、孟密等地，發現了天馬、漢龍兩關的遺址。當年李根源 12 歲。次年 4 月，駐英公使薛福成(1838-1894)的參贊姚文棟及黃致堯兩人自緬甸來九保，聽說李大茂曾經查勘過中緬邊界，便相約交談兩小時。李大茂告以考察木邦、孟密以及猛卯、隴川等地為英國人侵略之事。第二天，李大茂送姚文棟等人到北平門，13 歲的李根源隨侍往觀。[85]

80 李學詩、李根源纂修，《騰衝青齊李氏宗譜》，卷 1，頁 4。

81 李根源，《雪生年錄》，卷首，頁 337。

82 陳去病，〈李公蔚然家傳〉，收入李學詩、李根源纂修，《騰衝青齊李氏宗譜》，卷 3，頁 25。

83 章炳麟，〈故清騰越鎮中營千總李君墓誌銘〉，收入李學詩、李根源纂修，《騰衝青齊李氏宗譜》，卷 3，頁 22。

84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 10 年條，頁 339。李大茂的上書雖然最終未獲採納，但仍是李根源記憶中的重要經歷。

85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 17 年條，頁 342-343。

對李大茂和李根源這對關係騰衝抵禦外侵力量的重要人物在 1911 武昌起兵事情上的立場和表現，章炳麟的一段話頗值得玩味，他說：「清宣統三年秋八月，武昌起兵，張文炎以兵應於騰越，根源以兵應於昆明，而永曆之辱始雪。」後袁世凱得政，李大茂「又憂之」。[86]結合上文分析所見，章炳麟此說與兩重事實暗相吻合：其一，李根源親身參與的辛亥革命與晚明歷史有直接關係，對此章氏並不否認；其二，李根源的民族革命意識並非是在日本接觸了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之後方才形成的，雖然這是直接而有力的因素，然在騰衝李氏家族內部，早就有了推動革命的力量，特別是其父李大茂的影響。

(三) 雲南片馬問題

片馬是居於橫斷山脈之中，地處小江流域，四面大山環峙，略為方形的地方，是英、法勢力侵入雲南的首要之地。其受英軍侵擾，始自 1891 年，當時「有野人山人民焚斃英人之警訊」，英軍於是焚燒雲南的漢董、戶董等地報復，次年進兵昔董、馬董，侵佔野人山。1894 年，清政府派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勘定滇緬界限，締結《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但其中第四款規定未明，又未經實地勘測，直接導致了之後片馬問題的發生。[87]

1900 年正月初旬，英軍數百人及緬軍千餘人，從密支那向東北進入中國管轄的拖角等地。二月，這支英緬聯軍進犯茨竹、派賴等

86 章炳麟，〈故清騰越鎮中營千總李君墓誌銘〉，收入李學詩、李根源纂修，《騰衝青齊李氏宗譜》，卷 3，頁 22。

87 張鳳岐，《雲南外交問題》，〈片馬問題〉，頁 87-88。該條款第 4 款的中英文原文，參見該書頁 88-89。

地，土守備左孝臣在甘稗與英軍戰鬥，為國捐軀。[88]不久，廣西提督馮子材巡閱邊區到達騰越，李根源向其反映清軍將領劉萬勝失地喪權罪，請馮子材奏參並另簡派賢良官員，重新勘界，得到了馮子材讚賞。雖然此事最終未見施行，但李根源耳聞目睹了家鄉屢遭侵略而滿清政府無力保護的真實情形，[89]對他日後致力於推翻滿清而褒崇雲南地方文化精神的事業，有著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1910 年 12 月，英軍以先遣部隊先行，大部隊隨後，從密支那出發，越野人山，隨行戰馬千餘匹，在翌月四日進駐片馬，並宣佈高黎貢山以西為英國領土。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交部交涉不果。[90]事發之後，33 歲的李根源受雲貴總督李經羲(1859-1925)委託，辦理片馬防務，並會同迤西道籌辦交涉事宜。[91]李根源一行人自 1 月 28 日啟程，喬裝少數民族，深入小江，探得英軍虛實，獲悉了茶山、裏麻和怒求等地的形勢，至 8 月 2 日才結束，返回昆明。此行除了探清地形外，還繪製了《滇西兵要界務圖》126 幅、《圖說》2 卷，並提出了「進兵驅逐」、「推翻五色線圖，索還侵地，提請世界各國公斷」、「由外部要求先退兵後勘界，我總持定」等上中下三策。[92]

在探查邊界的過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李根源一行隨身攜帶了《滇系》等地方志史，他曾經選編著作的明代名臣由於仍有遺跡留

88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廿六年條，頁 349。參見張鳳岐，《雲南外交問題》，〈片馬問題〉，頁 90。謝本書，〈從片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緬邊界歷史沿革問題〉，頁 74。

89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廿六年條，頁 349-350。

90 參見張鳳岐，《雲南外交問題》，〈片馬問題〉，頁 90。謝本書，〈從片馬事件到班洪事件〉，頁 75-76。

91 李根源，《雪生年錄》，宣統二年條，頁 371。

92 李根源，《雪生年錄》，宣統三年條，頁 372-376。參見謝本書、李成森，《民國元老李根源》，頁 115。

存，還對後世追隨者起著精神激勵的實際作用。一行人在啟程之初，即拜謁王錫袞祠墓，李根源還「撰記一篇，附刻《滇五名臣遺集》後」。[93]此番拜謁之舉，明顯與他 21 歲時「遊覽」寶峰寺，「尋明季諸遺老故跡兩宿歸」的心情及感受不同，[94]而是更類似於他 1908 年身居日本，回憶在家鄉時的心情：「每過忠節、文襄故里，及謁清湑、忠壯墓，輒徘徊不忍去。獨立於斜陽荒草間，優乎若有見愾乎！」[95]

李根源在英軍入侵片馬之後拜謁王錫袞祠墓，顯然是對這位滇籍明臣有特殊尊崇。當時，距離李根源在 1908 年回國，時間並不長，他正任職雲南陸軍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總辦。[96]與上文所述李根源在滇越鐵路通車典禮當日的陳辭一致，作為講武堂軍事教學的負責人，李根源臨危受命，他的拜謁之舉，很顯然在尊崇和感化之外，另有一種軍人在臨行前的壯別意味和接續先賢志業的決心。

五、晚清民族革命對明史的宣揚與李根源民族主義的地域性特點

回顧晚清民族革命的歷程，類似李根源關注歷史並以史事作為鼓動革命反滿素材的例子甚多，幾乎成了革命黨人普遍採用的方法。其中，明代歷史又尤其受關注。在這一返本以開新的過程中，被賦予最高政治意味與文化意味的事件，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與政府官員拜謁明太祖陵。1912 年 2 月 12 日，宣統皇帝

93 李根源，《雪生年錄》，宣統三年條，頁 378。李根源，〈王忠節傳〉，收入《明滇南五名臣遺集》，頁 372 下。附記為：「宣統庚戌，根源有騰永邊界之行，除日宿祿豐，偕劉生欽丞謁公墓於城東十五里之公雞山。」

94 李根源，《雪生年錄》，光緒廿五年條，頁 349。

95 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遺集》，〈自序〉，頁 258 上。

96 李根源，《雪生年錄》，宣統元年條，頁 369。

溥儀宣佈退位。次日，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身分，發佈了《舉行中華民國統一大典通電》。[97]2 月 15 日，統一大典如期舉行，孫中山「率國務卿士、文武將吏祗謁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並發表〈謁明太祖陵文〉作為祝詞。這篇祝詞與同日發表的〈祭明太祖文〉都強調明太祖是在蒙古取代南宋，「神州陸沉，幾及百年」之後，「應時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復大義，昭示來茲」的重要帝王。宣統退位，是「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之所然。[98]這兩份文字的性質非常明確：不僅是革命黨人抵抗滿清，接續明代傳統的文化宣言，還是在民族革命過程中以尊崇明朝為旗幟推行民族獨立、反抗滿清事業成功後的政治宣言。

孫中山個人對中國歷史和傳統學說所知甚少，且其中大半得自耳食，[99]但民國臨時政府此舉，卻恰恰反映了革命黨人和支持革命的讀書人對明代歷史普遍眷戀的情形。因此在革命成功後，對曾作為宣傳工具的明代及其歷史表示尊崇，是必然的政治舉措。下面試依時序舉例說明。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軍隊攻陷劉公島，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軍慘敗，光緒皇帝派李鴻章赴日乞和。時年 17 歲的吳玉章(1878-1966)讀到光緒帝的乞和詔，與仲兄吳永錕相抱痛哭。受國難刺激，他將文天祥《正氣歌》等愛國詩篇書之於壁，朝夕誦讀，還特別讀了《明史儒林傳・黃淳耀傳》和黃淳耀(1605-1645)的文集《陶庵集》。[100]

97 孫中山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卷 2，頁 83-84。

98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卷 2，〈祭明太祖文〉，頁 94-95；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等合編，《孫中山年譜》，1912 年條，頁 112。

99 參見朱維錚，〈在晚清思想界的黃宗羲〉，頁 35。

100 劉文耀、楊世元，《吳玉章年譜》，光緒廿一年條，頁 4。

1896年，吳玉章又系統地閱讀了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王夫之《黃書》及譚嗣同的《仁學》、《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等書。[101]當 1904 年《浙江潮》在日本創刊時，軍事家蔣百里(1882-1938)在「發刊詞」中就將熟悉本土的歷史、地理和風俗等與自治聯繫起來，認為「欲爭自由，先言自治，然必於其本土之人情、歷史、地理、風俗詳悉無遺，而後下手之際，乃游刃而有餘」。[102]

在當時這類宣揚中國歷史(特別是明代史事)的論述中，章炳麟的言行頗為突出。[103]「蘇報案」後，章炳麟即準備撰寫中國通史，以發現「文明進化之跡」；[104]後來在「國粹」運動中被推舉為盟主，又高調闡揚歷史記憶，作為宣導反清革命的思想基礎；[105]結識蔡元培後，則講學於蔡開設的愛國學社，「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106]

由政治論述發展為群體性的政治行動，是 1902 年 4 月章炳麟發起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該會以堅決反對清政府統治為宗旨，目的是為了「振起歷史觀念」。署名的發起者除了章炳麟，還有秦鼎彝、馮自由、朱菱溪、馬同、周宏業等人，並徵得孫中山和梁啟超同意，孫、梁均複書願署名為贊成人，但梁啟超則另函要求勿將其名公佈。紀念會本決定在當年的 3 月 19 日，也就是明崇禎皇帝殉國的忌日，在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式，留學生報名赴會

101 劉文耀、楊世元，《吳玉章年譜》，光緒廿六年條，頁 6。
102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卷 2，光緒廿九年條，頁 153。
103 事實上，章炳麟去世後，弔唁之辭中也多將他與明遺民諸大家相提並論。參見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頁 103-104。
104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卷 2，「說明」，頁 24。
105 參見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頁 76-87。有關「國粹」學派的研究，參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頁 222-226。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附錄，頁 401-405。
106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卷 2，光緒廿九年癸卯條，頁 152。

者達數百人，學界為之振動。後來因為上野軒被日警監視，並禁止中國人開會，於是紀念式改在橫濱補行。香港、廣州、澳門等地人士從《中國日報》上獲悉宣言書，受其鼓舞，「頗為感奮」。[107]

訴諸武力的例子也有。在光緒廿八年(1902)，洪全福、謝纘泰、李紀堂等人為預備廣州起義而試圖組建的大明順天國便是。[108]雖然「大明順天國」的口號尚屬醞釀階段，還沒有成為公開的戰鬥旗號，但「大明」明顯暗指明代。[109]

從這些事例可見，在努力恢復漢民族的歷史記憶及宣揚明朝正序成為普遍性事件的晚清，在歷史中找尋可為革命所用的資源，是當時革命黨人的共識，也是推行民族革命的必然手段。[110]由是，李根源所為實是順應了革命需要之舉。但他以明代滇籍名臣及其著作為闡揚地域精神的主要載體和依託，又是他的特色之處。其內容比當時普遍以清初三大儒的言論為反清理論基礎的做法，更為近水樓臺，鼓舞也更切實、有力。加之清季民初的雲南面臨英、法兩大強勢入侵力量，地域內部的革命力量處於上升態勢，團結同鄉以成同道的努力很容易獲得成功。上文提到了旅日的滇籍學生和在雲南的青年加入興中會的數量大，儘管不一定是直接受李根源輯刻的兩部

107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卷 2，光緒廿八年壬寅條，頁 134。

108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 4 集，〈大明順天國失敗始末〉，頁 101-109。

109 張其光指出，「大明順天國」的旗號究竟何指，並沒有可作詳盡說明的資料。因此，僅能從「大明」的稱謂上，聯想其與明王朝的關係。劉強倫認為洪全福起義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君民共主的整體，而並非是明王朝的復活。參見張其光，〈大明順天國起義初探〉，頁 27。劉強倫，〈洪全福起義始末〉，頁 58。

110 這點從李根源所說「余嘗求南疆之事於灰燼之餘」中可見一斑。李根源，《曲石文錄》，卷 1，〈滇中瑣記序〉，頁 6。從更長時段的分析，參見 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8-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pp. 87-117.

滇籍文獻或《滇粹》的鼓動影響，但這三部書與革命刊物《雲南雜誌》之間卻有內在關聯，而《雲南雜誌》和《滇粹》又是向滇籍人士宣傳革命的重要出版物，於是，即使讀者對閱讀有不同需求，也都能從這一套面向雲南的出版物中，獲得鼓動革命的收益。

這一地域性色彩頗為濃重的革命宣傳方式，既有李根源關注鄉邦文獻的個人愛好因素，也有他家族背景和祖、父輩經歷的影響，更有他對親身經歷的外國侵略軍入侵故鄉事件的反彈。這三種因素使得雲南成為了促使李根源參與革命的重要推動力量。

隨著中華民國成立，李根源以鄉誼鄉情為宣傳民族革命思想之重心的特色逐漸消融，他關注鄉邦文獻的幅度卻更廣了，這同時說明瞭他的鄉誼情節深厚。1911 年之後李根源輯刻的典籍，有上文提到的孫繼魯六世孫孫鵬的《孫南村詩集》，與楊慎相友善的張含(1479-1565)的《張愈光詩文選》，楊士雪的《楊弘山存稿》，李元陽(1497-1580)的《李中溪全集》，還有上文提過的尹藝的《廿我齋遺集》等。這類輯刻明清及民國文獻的事情，一直持續到 1942 年。[111]很明顯，在民元之後，李根源出於鼓動革命反滿目的並為現世示法的刊刻古籍思路，已經為單純的保存鄉邦文獻所取代。革命反滿的目的達到了，宣傳、鼓吹反滿禦外思想的現實目的，也就不存在了。唯有學術研究及文獻整理，作為革命事業的成果，仍在繼續。

六、結論

現代意義的國家由國民、領土和統治權三要素組成。領土是國家觀念的基礎，但當國家成為革命的對象時，便需要從歷史的角度

111 參見陸星，《李根源傳》，〈李根源刻印書目〉，頁 308-310。

增強來自地域的認同感，以補充對國家認同感的缺失。於是，地緣政治容易被抬升到統一國家和維護國家觀念的高度。騰越人李根源在清末選輯滇籍明臣著作，並且以編選滇籍文獻《滇粹》作為革命刊物《雲南雜誌》的周年紀念特刊，就有在傳統地域文獻範疇內，從歷史中尋求支持革命的思想資源的涵義，而且，他此舉又因為地域性明顯，而頗具特色。

本文無意用任何理論範疇或政治標準來界定李根源，上文所及也只是其經歷和著作的一部份，但以之為個案，卻是試圖通過李氏的如下特點，考察清季民初這個思想上眾說紛呈、政治上風雲變幻的變革時代。李根源選編故鄉先賢文獻的行為，首先是對當時革命反滿及外國軍事入侵的社會環境之反應，故而他的敵視心理與反抗言行，有著明顯的針對性；其次，李氏明代遺民的家族背景與祖、父護土護疆的經歷，對李根源而言構成了直接的暗示作用與示範力量；第三，當家族傳承的精神引導力量與鄉先賢所代表的地域精神結合時，便使得李根源帶有地域色彩的民族革命思想帶有了自覺性。總而言之，李根源民族革命思想的形成，是歷史記憶與現實壓力雙重作用的結果，且這兩種力量都帶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

李根源雖然自稱熟悉東西歷史與世界名人傳記，但在東洋所學，從其著述中的反映來看，可能確實有限，[112]對西洋的新思想也瞭解不多；他能夠引為資借以投入革命的首選，就是故土的歷史與先賢的精神。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鄉邦文獻的重要性是李根源須臾不敢忘懷的，即便留學東洋，他也留意搜集明代滇籍名臣文集。[113]

112 這情況並非個例。留日學生由於有不甚重視學業、學風不佳的現象，所學便會相應打了折扣。參見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64。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99-202。

113 參見李根源，《曲石文錄》，卷 1，〈重刻張愈光詩文選序〉，頁 2 的自述。

另一方面，當雲南面臨外國勢力入侵的關口，仍有遺跡、遺文留存且可取用以成對照並能從中取法的明代歷史，便成了可用來鼓舞同志鬥志、培育地方革命凝聚力的歷史資源。而且雲南的地域威脅是來自英、法等外侵力量，抗禦外侮便兼有了自發性與自覺性，對家族歷史深厚的李根源而言，本土資源相應地更具吸引力。

此外，李根源的例子還顯示了與學術界已有的從地域角度理解民族認同問題的不同思路。有學者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關十八世紀拉丁美洲民族想像的研究，認為清末數量眾多的青年學生赴外國留學，有了朝聖(pilgrimage)經驗，便為超越傳統地域畛域的認同形式──民族認同提供了有利條件。[114]李根源的例子卻恰顯示，在清季民初的歷史背景下，面臨英、法等國入侵的西南邊陲雲南省，當國家危亡問題與地域安全問題合而為一時，擁有地方影響力的明遺民騰衝李氏家族後裔，選擇了運用有助於構建地域認同的歷史資源來充實民族認同的做法，以抵禦外侵、推行革命。這是個頗見地域獨特性和個人經歷特色的例子。從雲南一地來看，其鼓舞革命的價值要比類似通過追述黃帝、鄭成功等更具針對性，影響也更為直接。但由於其角度獨特，並不能簡單地為其他地方所挪用借鑒，因此在國家層面反而不如晚清利用黃帝形象構建國族的影響大。[115]

事實上，李根源此後的革命論述，並沒有發展到宣揚現代國家理論的層次，從其言論中看，鼓勵他參加革命的思想基礎和現實問題，一直停留在地域層面。而梁啟超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有更新

114 參見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頁 64，及註 8。

115 相關論述，參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29-34。

晚清政治概念的系統論述，宣揚「國家」、「國民」的觀念。[116]但李根源並沒有緊跟這些帶有顛覆性的政治新觀念，也沒有系統性地思考民族革命勝利後的國家政治形勢與政治走向。地域性民族主義的思想便轉而成了李根源的限制。或許這是由於雲南地處中緬邊界，受到英、法等外國軍事力量侵擾的壓力一直令李根源無力旁騖，也可能是他並未真正接受能促使他改換思路的新理念，鄉誼鄉情也就一直無法被取代。以 1940 年他主持編定的 136 卷本《永昌府文徵》為高峰，這類性質單純的文獻整理工作成了李根源在 1910 年代至 1950 年代的標誌性成果。

(本文於 2011 年 8 月 31 日收稿；2012 年 5 月 4 日通過刊登)

*本文在修訂過程中，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兆裕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張瑞龍先生及司徒琳(Lynn A. Struve)教授的指正，特此申謝。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修訂意見，本文已參酌改正，一併敬致謝意。

116 參見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頁 167-187。

附錄 《滇粹》目錄

序	湯增璧
凡例	呂志伊、李根源
求野錄	失名
也是錄	失名
永曆帝紀	日本石村貞一元明清史略
附錄永曆帝貽吳三桂書	日本丸山正彥著鄭成功傳
雲南世守黔甯王沐英傳附後	
嗣事略	失名
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傳	趙州師範先生著
雲南總兵劉綎傳	無名
騰衝參將鄧子龍傳	失名
金滄副使楊畏知傳	楚雄李天秩先生叢稿
明華蓋殿大學士謚文襄楊一清傳	失名
三寶太監鄭和傳	趙州師範先生著
山西巡撫孫繼魯傳	直隸龐凱先生著
兵部尚書蘇遼總督傅宗龍傳	失名
晉王李定國列傳	永北劉彬先生遺稿
衛國公胡一青傳	失名
南寧侯張先璧傳	失名
諸生薛大觀傳	江南布衣宋潛虛先生著
明京營副總兵申甫傳	江琬先生著
林啟俊傳	昆明趙元祚先生撰
文貞道傳	
武風子傳	方咸亨先生傳
鳥私泣集序	
明季忠烈錄	失名
丁亥紀略	李思揆
熊元仲傳	王思訓
李孝子傳	王思訓
旅滇聞見隨筆	失名

資料來源：李根源、呂志伊輯，《滇粹》，國家圖書館藏宣統元年鉛印本。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等合編，《孫中山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76。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中華書局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宋教仁著，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李根源，《曲石文錄》，民國廿三年蘇州曲石精廬刻本。

李根源，《雪生年錄》，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9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民國廿三年鉛印本。

李根源，《景邃堂題跋》，民國廿一年蘇州曲石精盧刻本。

李根源，《雲南金石目略初稿》，民國廿一年蘇州曲石精盧刻本。

李根源、呂志伊輯，《滇粹》，宣統元年鉛印本。

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0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1914 年雲南叢書本。
李學詩、李根源纂修，《騰衝青齊李氏宗譜》，民國十九年騰衝青齊李氏宗祠刻本。
孫中山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師範，《滇系》，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嘉慶十三年修光緒十三年重刊本影印。
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楊一清，《石淙詩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0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楊一清，《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楊繩武，《論文四則》，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0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1833 年世楷堂藏版昭代叢書本。
楊繩武，《鐘山書院規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6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1833 年世楷堂藏版昭代叢書本。

二、近人論著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4。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王振輝，《中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清末民初知識份子的困境與抉擇》，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王敏，《蘇報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江燕，〈《滇系‧賦產》的史料特點及價值〉，《雲南社會科學》，2003：5(昆明，2003)，頁 96-98。
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臺北，2002)，頁 49-119。
沈松僑，〈振大汗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臺北，2000)，頁 77-15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28(臺北，1997)，頁 1-77。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呂萬和、熊達雲譯，《日本政治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徐中煜，《清末新聞、出版案件研究——以「蘇報案」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徐志民，〈晚清中日關係中的留日學生報刊問題〉，《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5：4(北京，2005)，頁 24-32。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張其光，〈大明順天國起義初探〉，《學術研究》，1981：6(廣州，1981)，頁 24-28。
張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
張鳳岐，《雲南外交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陸星，《李根源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取締規則」風潮個案初

探〉，收入《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 2 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5，頁 125-160。

楊朕宇，〈1905 年早期留日學生刊物速亡原因評析〉，《理論界》，2009：8(瀋陽，2009)，頁 144-145。

楊海平、李剛，〈清末留日學生報刊述論〉，《編輯學刊》，2001：5(上海，2001)，頁 79-80、23。

楊毅廷編，《滇事危言》，北京：滇學堂，1911。

劉文耀、楊世元，《吳玉章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劉強倫，〈洪全福起義始末〉，《史學月刊》，1984：6(開封，1984)，頁 54-58。

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謝本書，〈從片馬事件到班洪事件—— 中緬邊界歷史沿革問題〉，《雲南社會科學》，2000：4(昆明，2000)，頁 72-81。

謝本書、李成森，《民國元老李根源》，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9。

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

Stephen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Native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Actual Concern Displayed by Li Genyuan's Collecting and Publishing of Ming Yunnan Bureaucrats' Works

Yang Xie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Diannan wumingchen yiji* and *Ming leishian huerfeng yijihekan*, the two classical works compiled and printe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Yunnan by Li Gengyuan (1879-1965) to examine how the biographies and works of eminent local scholar-officials of the Ming dynasty could be used to promote national revolution, but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A famous family loyal to the Ming dynasty since its ancestors originally arrived in Yunnan, the Li clan was a member of the local official elite. Genyuan was raised, however, under his father Damao's instruction to absorb revolutionary ideas by reading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 revolutionary career when he was still a youth in Yunnan. Genyuan also graspe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local terrain under his father's guidance, and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compiling a local gazette. He successfully combined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local images by collecting outstanding Yunnan official-scholars' works in Ming history to call for n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1910s when

facing foreign invaders such as the French and English, and Genyuan became a revolutionary leader. However,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Genyuan still dedicated himself to compiling local classics. He did not adopt the political theories that had already become dominan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Li Genyuan, Yunnan native, Ming official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national revolution